

《好东西》“新”在哪儿

□张斌

正如当年《爱情神话》一鸣惊人一样,作为其平行篇的《好东西》目前领跑贺岁档新片票房,影片有望凭借高口碑和高话题性,成为该档期黑马。两部影片从故事到视听都带有导演强烈的个人风格,也确实让《好东西》天然携带着从《爱情神话》接着说的因子,同时也意味着《好东西》具备的创新意识生发出了新的叙事生命力。

上海电影的新面貌

近年来,随着《罗曼蒂克消亡史》《爱情神话》《繁花》等为代表的沪语影视作品的上映播出,被大量影像抽空能指的上海又重新回到了观众的视野。这些典型性的地缘影像不仅从纵向上探索了上海城市叙事资源的多元性与多样性,也在横向上为地缘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叙事途径。

《爱情神话》通过上海话在电影中的全面回归,生动叙说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性格色彩,但这份亲切、熟悉、浪漫的影像书写更像是写给上海观众的一封信。对埠外观众而言,这部电影的“异质感”一方面带来地缘空间上的文化陌生感,但也会加剧“上海它很好,但与我无关”的心理认知距离。因此,如果说《爱情神话》通过极致放大地“腔调”的叙事策略锚定了上海地域空间的文化底色,那么《好东西》则提供了“如何更好讲述上海故事”的多元视角。

《好东西》的故事依旧发生在上海,但导演几乎完全放弃了沪语却依然讲述了一个很上海的故事。一方面,电影为观众提供了富有辨识度的上海城市日常空间场景。电影在上海25处取景,涵盖51个风格各异的点位,其中洋房、街道、小酒馆、咖啡厅、livehouse、展览馆这些具有鲜明上海城市标识的文化空间,融汇在川流不息的车流、忙碌的生活流之中,溶解为具象化的上海风土人情。更为重要的是,电影深入展现出当代上海人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向度。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异乡人状态或许才是这座城市情感的最大公约数。影片中铁梅与小孩儿多次毫不掩饰说出自己是“山西人”,她们不再需要回答有关于“上海人”的身份问题,能够自在、自洽地驻足在街道、老洋房、天台、摩登天空以及酒吧等上海任意的城市空间意象之中,充分感受这座城市带给自己生理与心理的双重体验。电影中作为异乡人的“沪漂”族与上海这座城市不再是充满结构张力的二元对立关系,铁梅、小叶、小孩儿这些女性角色既是异乡人也是新上海人,她们在工作、学习、情感上遭遇的迷茫与困境,顺理成章地成为“上海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中三位女性日常出入的场所,以及和她们打交道的人们,大致完整地勾勒出上海都市人群的生活场景。影片中在路边席地而坐弹琴唱歌的年轻人,散发上海人幽默的门卫保安大叔等群体形象,淋漓尽致地描摹出当代海派风情与都市生活烟火气,与影片的主人公们共同构筑了上海文化多元互动的景观全貌。由此,“沪漂”与“土著”的地域标签消解为都市景观中的“一般大多数”,这座城市与城市里的人们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情感汇合,进而生动折射出海纳百川、大气谦和、开明睿智的上海城市文化精神。

《好东西》不再需要以强烈的“沪语文化”标记上海,但影片的每一处都漫溢出更加浓郁的上海味道时,上海这座城市更为清晰化,上海故事也变得更为鲜活。

当代喜剧的新表达

《好东西》不仅延续《爱情神话》讲述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同时也延续了其先锋话题与幽默语言的喜剧风格,甚至在喜剧类型的演绎上显得更为游刃有余。

《好东西》的喜剧特质首先体现在对人物角色的反差处理上。由于影片囊括爱情、亲情、友情、女性职场与家庭处境、教育理念等新时代关注的多元社会议题,因而通过设置不同代际、不同性别、不同人生经历的关系层次,不仅让角色对这些社会议题的讨论显得合乎情理,也为喜剧效果的发生预留充足的互动土壤。其



电影《好东西》剧照

中,如果把单亲妈妈王铁梅、女儿王茉莉、乐队主唱小叶这三位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经历的女主人公拎拎出来,都能够达到传统苦难叙事的书写预期,但导演并没有选择重复苦难叙事,而是放大三位女性角色性格中的“另类”气质,通过挖掘角色之间互动的化学反应,从而实现超越苦难叙事的喜剧内核。此外,通过泼水撕衣、比拼吃蒜“雄竞”诙谐桥段,影片实现对王铁梅前夫、男鼓手,以及眼科医生三位男性角色的颠覆性改造。这些真实鲜活、反差生动的新型男女群像,为影片铺垫出轻松诙谐的氛围基调。

《好东西》里情感丰富妙趣横生的男女群像,是在高度凝练、精雕细琢的语言艺术中生动呈现的。该片继承了《爱情神话》里那种百无禁忌、短兵相接的语言爽脆劲。信息量大、包袱密集的语言文本配合演员日常生活化的表演,将台词中蕴藏的喜剧能量最大化释放。犀利幽默、大胆前卫的台词不仅承载着社会热点甚至尖锐话题,也对这些社会议题作出先锋独特、有趣有梗的观点表达。影片男性角色在讨论“性别文化”议题时,征用“上野千鹤子”“结构性问题”等学术性术语,不仅形成具有反讽意味的幽默感,也展现出语言艺术的思想性,具有反叛意味的空间。

《好东西》作为以对话文本为核心支撑的“话唠”电影,严格意义上是以情景为导向的喜剧类型(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情景喜剧”)。《好东西》里强大的台词信息密度以每个特定的场景语境实现段落化切分。尤其是影片中几场精彩纷呈的餐桌群戏,通过高度浓缩的“饭桌闲谈”对现实进行换位模仿,月经羞耻、性别文化等社会敏感议题得以在轻盈、轻松的现代餐桌文化中表述出来。虽然影片中话锋交互的对白情节不胜枚举,但有关王铁梅为何离婚、小叶对原生家庭的态度立场、小马和父亲矛盾关系的细节等展现,电影尽量保持冷静与克制,选择在语言的缝隙之间,将现实的面貌隐藏在嬉笑怒骂后的留白之中。导演对语言幽默性与思想性的双向兼顾,让她开辟出一条有别于开心麻花、宁浩、冯小刚的当代喜剧创作的创新路径。

提供观察当代女性生活的新视角

显然,展现当代女性现实生活的不同截面,关注女

性成长话题是《好东西》这部电影鲜明的特点。和仅仅简单地男性气质附加到女性身上从而提供所谓“女性觉醒”的理想方案的电影作品不同,女性已经觉醒才是《好东西》的故事起点。它以三位在生活里面临各种问题的女性群体为样本,为观众提供了观察当代女性生活的多维度窗口。

王铁梅就是一位典型的觉醒女性,她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稳定的情绪内核。当王铁梅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母职和外界的评判标准时,导演又以机智幽默的讲故事方法,缓解这份附加在觉醒女性身上的“痛苦感”。王铁梅虽然是母亲,但她可以继续工作、谈恋爱,也能在“我为你去结扎”、撕衣服男性话语、行为时,自在大方地说出自己的不舒服。同样,小叶自身已然背负各种旧创伤,但她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在王铁梅、小孩儿的身边,也通过王铁梅找到治愈自己的方法。影片中有一组富有想象力和生命力的蒙太奇对此做出了隐喻性表达:小叶带着小孩儿辨识各种声音,小孩儿听到和形容出的各种声音的形式背后,恰恰是妈妈王铁梅生活琐碎的瞬间采撷。影片在相似蒙太奇的来回叠加过程中,不仅让这位单亲妈妈美好坚韧、自由松弛的个人品质跃然纸上,也让三位女性之间的心灵走向契合。

影片还对男女关系进行校正。《好东西》看似以大量性别角色反转的场景来塑造“大女主”式的爽感叙事。但在轻松调侃,甚至有些嘲弄反讽的故事推进中,不难发现影片中的男性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女性也绝不是完美主义的化身。影片借王铁梅前夫、鼓手老师之口,轻盈地点出男性在女性主义语境下虚与委蛇的佯装态度,也善意地提醒女性主义本身的局限与困境。影片中的男性角色并不是单纯的“工具人”。无论是认可大男子主义而离婚,而后懊悔的前夫,还是成长于女性缺位的原生家庭的小马,都在某种程度上指涉了超越女性主义意涵的所指。导演试图传达这样一个事实:女性主义从来不是通过压迫一方成全另一方,而是让每一方都意识到整个社会结构性力量对自身施加的影响,而这是男性女性共同需要面对的社会议题。

影片最后还提供了“不再玩他们的游戏”的答案。王铁梅可以暂时不做“大女主”,小孩在做观众和上台表演中,选择了写作;小叶最终学会拒绝男人,与原生家庭和解,做回潇洒的自己。这些女性角色不再需要通过自身努力打破社会尤其是男性对她们刻板印象,她们在破除标签、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找到让内心自治的标准。影片关于女性议题的讨论皆没有定论,给观众留下充足的思考空间。因为一切未完待续的“好东西”,或许都在“等着你们长大后出现新的游戏规则”才会有答案。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

近年来,有关“文影”联动的话题成为电影从业者竞相关注的焦点。在刚刚落下帷幕的金鸡电影论坛上,由中国影协、厦门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作协社联部、北京电影学院联合主办的文学论坛别开生面。论坛发布的文学与电影共创计划名单中,共有《空无一人》《月光草原》《倦戏》《骑鹅的凛冬》《总统套房》《瑞贝卡》《故乡》《何秀竹的生活战斗》8部文学作品入选。活动现场,电影业界人士从故事梗概、作者简介、故事亮点、改编方向、对标电影等多元维度,对入选文学作品进行现场推介。现场与会嘉宾还围绕当代电影中的文学性议题展开讨论,力图在变动不居的时代中,探寻电影中文学性的当代发展,特别强调借助文学更好连接当代年轻观众,扩大电影市场。

新的“文学性”或正在诞生

一直在流动之中的文学性,等待我们给予它崭新的内容。作家、编剧李修文敏锐地观察到,新的“文学性”或正在诞生。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小说越来越散文化,长篇小说越来越短,过去主人公有一个漫长的成长历程,他们或完成一个英雄壮举或完成一个历史使命,但是这样的叙事在今天越来越难以成立。他还发现,过去在文学的叙事中充满大量惊险情节,这些情节会推动主人公完成这一漫长的成长历程。但时至今日,很多情节是高度细节化的。情节所需完成的功能与使命,越来越被个体命运同现实生活细节之间的关系讲述所替代。这种新的文学性对今天的电影叙事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比如英雄叙事,李修文认为从卡夫卡开始,纯文学领域内其实已经很少能见到那种改天换地的英雄了,但是我们的电影故事还在塑造着这种英雄。在他看来,今天的一些英雄形象可能没有战胜灾难,可能只是灾难的见证者,但他见证了人类脆弱、无力的时刻,其行为闪耀着人性的光芒,他仍然是生活中的英雄。

作家、编剧冉平结合自身创作,谈到电影《封神》所讲述的就不是一个传统的英雄故事,而是一个青年犯了错误,逐渐走上自我救赎之路的故事。他以为纣王是英雄,自己也该成为纣王那样的英雄,结果他犯了一个错误,告发了自己的父亲,从而引发了一个惨案。而后他要找回自己,并逐步认识到,不是要成为别人眼中的英雄,而是要成为自己的英雄。这样的电影叙事同当下人们的共情点在于,大家谁都可能犯错,重要的是勇于面对自己,纠正错误。

电影在小说停止的地方出发

作家须一瓜有多部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比如小说《太阳黑子》被改编为电影《烈日灼心》,小说《淡绿色的月亮》被改编为电影《月色撩人》。在她看来,文学和艺术的最高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追踪人性的“靶心”,那里有人的困境,也有人的无限可能。她认为,电影的可调度手段十分强大。“有时候我把我的小说交给电影人,我会真心地和他说,电影是在小说停止的地方出发。我有一部小说里面写到了大量的音乐,费了很大的劲儿都没有办法传递给读者我自己的第一手感受。那么谁能完成呢?只有影视。”须一瓜认为小说家也有自己的倔强与坚持,作家们力图发现人生中更多的隐秘空间、情感与精神的缝隙,她把作家比作章鱼——“触角必须坚韧不断地向上攀升、探索。”

香港城市大学文学及历史系教师李思逸同样认为,任何一部具有文学性的电影都不会被文学的手法、模式、语言、审美所束缚。在他看来,电影中的文学性往往跟叙事有关,但不是对叙事的直接“翻译”,不是用影像把文字描述的故事重讲一遍,而是通过影像叙事空间的建造,去丰富、重新阐释小说中原有的故事,甚至编剧应抱有更大的野心,将小说家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带到电影中来,而不是将文学视为模板来使用。

回到那些永恒不变的主题上去

作家、影评人阿郎认为,电影和文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艺形式。比如文学需要“破”,电影对“破”需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电影有类型、有公式。但无论是文学的文学性,还是电影的影像感,它们都指向文学艺术的本源。当下电影制作缺少独立性和独特性。因为工业规模、制作模式的不同,电影注定是集体的艺术。而写作则不同。作家在写作时可以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而在电影导演那里,他需要保持整个剧组的正常运转,有时不得不妥协,所以当我们说到文学性的时候,不妨回到创作的原点上来。

李思逸谈到,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批判,后来我们用这句话形容一种现代性的经验。今天的读者能够同过去的文学作品产生共鸣,今天的观众能够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早期电影感同身受,是因为它们表达出来的内容,比如人类自我同社会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杨蕊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变化与不确定性的时代里,我们更加提倡回到原点,回到那些永恒不变的主题上去,它们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基石,更是借助文学通往观众内心的不二法门。

在变动不居的时代,探寻电影中文学性的当代发展

□本报记者 许莹

本报讯 11月19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纪录片《叶尔羌河》研讨会在京举行。作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工程的重要成果,该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创作主线,运用4K超高清技术手段,深入挖掘叶尔羌河流域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讲述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故事,展现出一个开放包容、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新疆形象。该片被纳入国家广电总局“十四五”纪录片重点选题规划、国家广电总局“记录新时代”纪录片精品项目、上海文化润疆重点项目。

与会专家认为,《叶尔羌河》做到了宏大主题的柔性表达。叶尔羌河孕育了新疆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不仅是一条自然之河、人文之河,还是一条历史之河、未来之河。该片以人为本、以河为线,发展为面地串联起丰富多元的新疆叙事,让观众得以通过影像领略这里的自然奇观、生态保护、民族风情、文化交融与百姓的安居乐业,体会这里的和谐之美。专家谈到,该片在取材上颇具时代感,着重反映了喀什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充分运用三维特效、虚拟引擎等技术手段,为观众呈现了一场有格调、有质感、有温度的视觉盛宴。

本报讯 11月2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市总工会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管理处、文艺学院及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北京职工书画协会共同承办的“四时并运——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作品展”开幕式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艺术馆拉开帷幕。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周庆富在致辞中介绍,“四时并运”,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妙诠释,亦是对新时代艺术创造活力的热切期许,更是对伟大祖国75周年华诞的盛情礼赞。此次展览的参展艺术家,既有莫言、姜宝林、赵建成、苏百钧、何家英、田黎明、杨飞云等影响深远的前辈艺术家,也有创作思维活跃、勇于探索的艺术新锐。展览汇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书法、油画、雕塑等专业领域名家佳作百余件。他们的作品表达了艺术家的学术关切与人文精神,也体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70余载历史凝集的文脉与气韵。这些作品与太庙古建筑群相映生辉,是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生动实践。观众不仅能够近距离领略艺术之美,更能在历史与现实的回响中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日。

人民音乐出版社 创建70周年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11月21日,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主办的“传承专业出版文脉 弘扬中华音乐文化——人民音乐出版社创建7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人民音乐出版社执行董事(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杜永寿谈到,人民音乐出版社创建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守职责使命,积极探索特色音乐专业出版之路,在主题出版、文化出版、学术出版、教育出版、大众出版、版权业务等板块推出以中为主、中外并举,囊括音乐各细分领域的万余种出版物。踏入新征程的人音社,将不断增强发展活力与内生动力,持续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履行使命任务,唱响时代强音。中国音协副主席张千一作为作者代表、专家代表向人音社创建70周年表示衷心祝贺。他谈到,人音社不但向读者推介国内外经典音乐文献,而且将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理论、教育、表演等通过出版载体进行传播、推广,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会议现场还举办了人民音乐出版社创建70周年精品出版物展及人民音乐出版社社史展。

电视剧《太阳星辰》 11月20日开播

本报讯 11月20日,电视剧《太阳星辰》在腾讯视频开播。该剧由黄国强执导,唐耀良编剧,陈伟霆、刘雅瑟领衔主演,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西九龙重案组督察杨光耀在追查一起连环凶杀案的过程中,意外穿越到2018年,与自己同岁的搭档陈凯晴,携手追查尘封多年的连环杀人案的故事。

剧集对香港警察跨越25年的缉凶之路做了详细呈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缉凶探案有了全新的手段和迭代的技术支持,现场勘查、审讯拘捕等也都相应有了更加规范、科学的流程要求,但警察缉凶的不努力和对正义的坚定追寻始终不曾改变。与此同时,杨光耀在缉凶路上不忘追寻亲情,期间同样不乏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和探索,以及充满奇遇的成长和蜕变。《太阳星辰》在讲好一个张力十足的故事的同时,拓展剧集的表达深度为观众带来更多情感共鸣。

据悉,该剧已在Netflix同步上线,并入围戛纳电视节第八届MIPDrama展映。

(杨茹涵)